

PM PRESS PAMPHLET SERIES



No. 0007

Prison Round Trip

BY KLAUS VIEHMANN



PREFACE BY BILL DUNNE
INTRODUCTION BY GABRIEL KUHN

监狱往返之旅

克劳斯·维曼 (KLAUS VIEHMANN)

比尔·邓恩 (BILL DUNNE) 的序言



加布里埃尔·库恩 (GABRIEL KUHN) 的介绍

前言

没有什么比激进的左翼分子更确定的是，为革命性地取代帝国主义范式而努力的激进左翼分子将越来越多地入狱。

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日益尖锐；随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迫使第一世界资产阶级需要压低它所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临界点即将到来。

然而，第三世界国家对革命运动的镇压策略不会在第一世界奏效，至少现在不会。那里的人民太沉迷于政治神话中，认为“自由”政府不会掠夺公民，阶级战争是“外部煽动者”的虚构。

此外，第一世界社会往往一体化得太好了，以至于像苏哈托的印度尼西亚甚至维德拉的阿根廷那样的大规模掠夺在工作完成之前无法充分隐藏。见证布什反动的美国政府最近在酷刑和杀害非公民方面的失败。

此外，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口有更大的能力抵抗他们的苦难。

因此，监狱将成为镇压机器的前沿，因为当前的统治阶级试图通过将其挑战者定罪、丧失能力和恐吓来维持其霸权。

前政治犯克劳斯·维曼（Klaus Viehmann）在作为武装斗争的实践者被捕后，在德国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中与德国政府进行了 15 次长时间的较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提出了一个战略和战术例子，**以继续在监狱环境中争取最公平的社会现实，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完好无损地在压迫中幸存下来。**

他正确地断言：屈服于资产阶级国家强加的替代意识，无异于政治上的死亡，因此也就是个人的死亡，无论残余的物质状态如何。

此外，克劳斯还表明，作为政治镇压工具的监狱幸存者的严酷性为人们提供了超越黑暗的混凝土角落和剃刀铁丝网灌木丛的教训，这些角落和铁丝网灌木丛在某种程度上武断地定义了束缚和自由之间的界限。

每个渴望革命的人都有义务在他/她找到他或她自己的任何组织中奋斗。克劳斯表明，这项义务是幸免于难的关键。监狱是一个事实上的组织。

寻找同志、朋友、潜在的同志和朋友——无论是在卑鄙的内部还是外部——以多么有限的方式与他们抗衡专制现状——都是很好的建议。

这可能涉及直接和激烈的行动，更常见的是，它需要阅读和写作以及以其他方式进行交流。这种抵抗维持了一种政治意识，否则这种意识可能会被流血并被挤压到无法辨认的地步。

虽然做梦、幻想和推测作为一种严格的大脑活动可能会转移注意力，并有助于制定我们将要建立的未来愿景，但它们本身是不够的。确实，它们可能会使人分心。

他们的结果必须与经验现实的变幻莫测和其他人的结论相比较。毕竟，实践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这种统一的一部分是通过直接行动公开抵抗镇压机构，但更大的部分是维持和改进解放的工具。

克劳斯描绘了如何在可能的情况下，主动和被动地反对侵犯囚犯保留和有争议的权利，并在没有发生这种情况的大量时间里，通过阅读、写作和以其他方式与监狱内和跨界障的人互动来做到这一点。

此外，克劳斯解释说，我们不能随波逐流。一个孤立的囚犯会发现，仅仅根据监狱管理的规范和它可能提供的任何资产阶级媒体——甚至仅仅通过监狱人口的犯罪分子特征的规范——来与世界建立联系，将导致分析和态度暗示自己进入意识，而没有警惕地努力将它们置于语境或排除之外。与世界无关，只是沉溺于假定的痛苦中，甚至更糟。

条件、时间和地点总是支配着斗争的方式。克劳斯探讨了在监狱中，权力关系如此不对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战斗，并且“没有绝对正确的行为方式”。今天的有效行动可能明天就会适得其反。

各司法管辖区在可能和可能致命的方面差异很大，正如克劳斯将德国政治监禁与过去的拉丁美洲军事独裁政权和纳粹古拉格的对比所说明的那样。

即使是现在，监狱条件和其中的实际政治行动在第一世界司法管辖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区了。

监狱内外的社会政治生存战略不一定意味着个人的肉体生存。

克劳斯以 RAF 的绝食抗议及其悲惨的死亡为例：他们把囚犯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力量，并动员了外部支持，否则这些支持可能会受到打击。

面对这种团结，该机构退缩了。爱尔兰共和军囚犯的绝食抗议和他们的殉难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土耳其政治犯现在对 F 型（隔离）监狱的死亡禁食也是如此。

阶级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会有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有时，囚犯必须加剧矛盾——在牢房里设置路障，拒绝改变他或她的处境，尽管这是一个失败的提议；身体上抵制不公正，承担后果；破坏监狱或强迫劳动或组织罢工，不惜一切代价；尝试外围；提起申诉、令状、诉讼，尽管它们与“柴油疗法”¹和其他报复有关。有时损失发生在最好的分析中，有时这种行动的结果对群体比对个人更好。然而，它们往往是原则或分析所要求的，**结果证明是值得的，因为它们使斗争向前发展，使机器向后退。**

这种行为还抑制了镇压者选择他们的实施者，作为默许下一次压迫增加的人，并使其更容易强加给后来的受害者。

个人是政治的，这在左派是不言而喻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

克劳斯告诉我们，我们绝不能让监狱制度过分地关注个人，让我们从自我的角度看待世界（和我们的监禁），用克劳斯的话来说，让我们变得自负。

他抒情地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存意味着体验自己是一个在社会、政治、心理和情感上自主和自我负责的人。这需要打破你的孤立.....。那些无法超越自己囚禁的人.....将无法在他们艰苦的处境中找到意义。只有通过这种超越性与社会基础设施建立联系，我们才能播种和收获在综合个人和政治的社会学反馈循环中建立的解放。

我们每个人都只有单一的、有限的生命，它的青春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减刑。这可能使10年、20年、30年或无期徒刑的前景极具威胁性和令人生畏。

然而，克劳斯透露，这种明显的厄运是可以避免的感知问题。不要纠结于时间的流逝，我们学习，使用它；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仅仅因为我们宁愿做其他事情并不意味着无事可做。

不要为平淡无奇而苦恼！活出生活！我们不会“错过”监狱生活，我们只是要领导一个不同的生活——就像如果发生了许多事情中的任何一个而不是逮捕一样。用这种生活去读、写、学习、学习；在自由这样做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教书。

即使与作者和无法发送的写作的互动如此之少，它也是工作、联系和有价值的——生活。正如克劳斯所说，这是最重要的建议。

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地理解我们为什么寻求革命以增加实现革命的可能性。

维护和磨练斗争的工具，并与他们一起改善设施。一本书、一本杂志、一份报纸是一根锯条、一个切割的栅栏、墙上的一个洞，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学习如何做一些材

料——电力、焊接、机械、计算机——等等。我们是物质世界中的物质存在，知道如何操纵物质也会提高实现革命的可能性。

而在物质上，不要忽视身体，这是最基本的奋斗工具。它不能被贬低为仅仅是肉；心灵和身体是共生体，都是我们潜在的革命者的基本要素。运动几乎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运动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身体运动；这是治疗，它从设备中窃取时间。

沟通是所有其他行动都源于此。这是克劳斯倡导阅读、写作和互动的内在和核心。

为了在革命运动的社会关系中成为自主的、对革命运动负责的人，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沟通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与我们的内部和外部沟通一样有效。

我们阅读、学习、理解甚至根据他人的经验采取行动的能力，以及交流这些知识的能力，最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来完善的，这使我们能够促进社会解放。

克劳斯对生存策略的看法告诉我们，我们不仅可以这样生存，而且可以继续为解放事业服务——这实际上是一回事。我们可以在不屈服或放弃的情况下被俘虏。

我无法从经验中评论克劳斯的演绎，即这样生存将如何促进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降低街头的安全存在，而没有实现这种转变。但我仍然在这里，正如克劳斯所说的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幸存者将是仍然好奇的。所以我认为他的结论也是正确的，即“生存后还有生命，仍然值得活下去”。

比尔·邓恩

USP 大桑迪

2008 年 11 月 20 日

比尔·邓恩于 1979 年 10 月 14 日被捕。他被警察开了三枪，据该州称，他参与了试图将一名同志从西雅图监狱中解救出来的企图，作为一个未具名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一部分。1980 年，他被判处 95 年徒刑，1983 年连续被判处 15 年徒刑，并因企图越狱而同时被判处 5 年徒刑。正如他所说，“总共 105 年是‘他们愿意假释’的判决。”

介绍

《监狱往返之旅》于 2003 年首次以德文出版，名为《Einmal Knast und zurück》。这篇文章的作者克劳斯·维曼（Klaus Viehmann）因在 1970 年代参与德国的城市游击队活动而被判处 15 年徒刑，十年前被释放出狱。

《Einmal Knast und zurück》首次刊登在 1993 年创刊的《Arranca!》杂志上，恰巧是维曼获释的那一年，旨在鼓励激进左翼和自治主义圈子内的批判性辩论。这篇文章随后在各种论坛上转载。它反映了监狱生活以及如何在充满敌意和压迫的监狱环境中保持理智和政治正直。

与阿兰卡一致！它所写的问题是，“生存策略”是它的中心主题。

“Einmal Knast und zurück”很快找到了超越德国边界的观众。多亏了同志们的翻译和激进的传播网络，从西班牙到希腊的政治犯们都热切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这是该文本首次向更广泛的英语读者提供。

克劳斯·维曼（Klaus Viehmann）在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河谷长大。他在 1960 年代后期反建制叛乱背景下被政治化。

1972 年，为了避免服兵役，他搬到了西柏林，因为二战后德国分裂期间，该市的居民免于征兵。

维曼将 1973 年 9 月智利的军事政变视为其政治发展中的关键事件。

用他的话说，推翻阿连德政府“摧毁了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后幻想”。因此，城市游击斗争似乎比以前“更合理”。¹

1975 年，Viehmann 与 6 月 2 日运动（Bewegung 2.Juni），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四个主要城市游击队团体之一，其他是红军派系（Rote Armee Fraktion）、革命细胞（Revolutionäre Zellen）和 Rote Zora。²

红军派系（RAF）是这些团体中第一个也是最持久的，并且仍然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整个 1970 年代的壮观行动引起了深远的关注，一个专门的同情者圈子，并在德国实施了有效的戒严令。

1977 年秋天，随着所谓的第一代最杰出成员的未决监狱死亡，RAF 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然而，该组织又活跃了二十年，直到 1998 年最终解散。

RAF 在一系列理论文件中塑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日益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西德的第二个城市游击队，总部设在西柏林的六月二日运动（2JM），致力于反专制原则，并为日常斗争提供武装表达。

它成立于 1972 年 1 月，其成员来自激进的基层和社区团体，包括学生和工人。

革命细胞（RZ）是一个植根于非教条主义左翼的团体，于 1973 年宣布成立。RZ 很快分裂为“社会革命派”和“反帝国主义”派。

后者与主要来自中东的国际游击队合作，其参与西德以外的高层劫持人质和劫机事件将证明极具争议。

另一方面，由仍然活跃在地下的成员组成的社会革命派，将采取许多与当时的民众斗争有关的行动，通常是低级的，在左翼获得令人羡慕的支持。

如果说 RZ 的社会革命派很受欢迎，那么对于从 RZ 发展而来的妇女游击队组织 Rote Zora 来说，情况可以说更是如此。

Rote Zora 主要集中在妇女斗争的核心问题上，通过 1980 年代针对基因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行动运动，将发挥其最具影响力的作用。

革命小组和 Rote Zora 都在 1993 年结束了他们的活动。

克劳斯·维曼（Klaus Viehmann）于 1978 年在西柏林被捕，被指控加入 2JM 和一些相关活动，包括抢劫银行和释放囚犯，并被判处 15 年徒刑。

Viehmann 是 2JM 成员之一，他反对任何威胁该组织自治的合作——这涉及与国际游击运动的反帝国主义联盟，以及与红军派系的更密切联系。

事实证明，德国游击队参与劫持客机在该组织内部引起了特别大的分歧。最终，冲突导致了 1980 年的分裂，当时一些成员加入了红军派系，而 Viehmann 和其他人则没有。

这标志着 2JM 作为一个活跃组的结束。维曼随后强调了他对革命小组的社会革命派的长期亲和力。

在狱中，维曼写了一篇文章，成为 1991 年出版的《三比一》一书的核心内容。这本书向激进的德语读者介绍了“三重压迫”的概念——压迫性社会结构中阶级、性别和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被证明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自治主义者的圈子里。

自获释以来，维曼一直积极参与各种左翼项目，包括声援二战强迫劳工和哥伦比亚工会成员的运动。

作为作家、翻译家和平面设计师，他仍然参与许多出版活动。他还是两本记录德国自治主义政治海报艺术历史的长篇巨著的合编者：hoch die kampf dem (1999) 和 vorwärts bis zum nieder mit (2001)。他的家再次是柏林——今天正式没有分裂，但正如他所说，“一个需要做很多事情的地方”。

加布里埃尔·库恩 (Gabriel Kuhn) 是奥地利出生的作家和翻译家。他是 Alpine Anarchist Productions (www.alpineanarchist.org) 的创始人，并在激进理论，文化和政治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他为 PM Press 撰写了《快乐罗杰下的生活：对黄金时代海盗的反思》(2009 年)，编辑了《为革命而清醒的生活：硬核朋克、直截了当的边角和激进政治》(2010 年)，并翻译了古斯塔夫·兰道尔的《革命和其他著作：政治读者》(2010



年)。

克劳斯·维曼 (Klaus Viehmann) 在1978年被捕几周后的照片。

监狱往返之旅

砰。你牢房的门是关着的。

你在被捕中幸存下来，你很生气，因为你没有更加小心，你担心他们也会抓到其他人，你想知道你的团队会发生什么，是否已经叫来了律师——当然，你没有表现出这些。

武器，假文件，你自己的衣服，都消失了。

他们扔给你的囚服和鞋子太大了——也许是因为他们想和你玩愚蠢的游戏，也许是因为他们真的把“恐怖分子”吹得不成比例——而且对你自己外表的控制权从你手中夺走了。

你环顾四周，试图了解你接下来几年将在哪里度过。



多年后的今天谈论生存策略有什么意义？是否值得尝试组织和总结您的经验？无论如何，将它们带入单词和句子是很困难的。

然而，对于那些将来将在监狱里度过的人来说，它们可能是有用的。

此外，由于（政治）囚犯的经历既不是超社会的，也不是非历史的，他们的生存策略也可能帮助那些将日常生活体验为某种协调形式的“过日子”的同志。专注于重要的事情，有意识地计划你的日常生活，以有意义的方式使用你的能量——这些都是有用的品质。

生存策略是个人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也是在修辞上针对你的，而不是抽象的第三人称），但不是自负的。解放和解放不是发生在个人内部，而是社会历史过程。

用彼得·布鲁克纳的话来说，“只有晚期资产阶级才把自由和独立变成了一个‘内在’的问题。这显示了所有个体生存策略的局限性。生存只能通过社会解放变成生活。

但这是另一个故事，监狱几乎不会发挥作用.....

在监狱中，生存策略的必要性是迫在眉睫的；没有他们，你就会受到敌人的摆布。监狱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它是由那些将你视为敌人的人设计的。不要对此抱有幻想。

在普通监狱中，尤其是老式监狱，条件往往是残酷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但至少会有社会结构。在孤立或最高安全单位中，社会关系受到控制，规范，废除。

孤立意味着缺乏社交生活和自己的存在。除了你自己，你一无所有，你必须找到处理它的方法。这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事先知道谁会顺利通过监狱，谁不会。

对于生活经验不足、政治自我激励有限、未来计划不确定（可能是自负）的人来说，这将是困难的。

一本丰富多彩的传记，其中监狱并不标志着第一个艰难时期，即使面对可怕的情况也保持乐观，以及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能力，所有这些都帮助。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¹可能会说，“那些只从书本上获得知识的人应该被放在书架上”，但如果关于某些事情的知识只是以这种方式来的，那不一定是悲剧。

我没有经历过肉体折磨、死亡威胁或被关在黑暗的牢房里。然而，对这些经历的个人或文学描述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经历并度过难关。

本文的经验依据（如果您愿意的话）是15年监禁。1978年之后的七年时间里，他们被隔离或与一小群囚犯在一起，其中五年是在最高戒备单位（莫阿比特和比勒费尔德）度过的。从1986年到1993年获释，我被关押在德国旧监狱韦尔（Werl）的一个特殊的“安全牢房”里。

我每天和其他囚犯一起在院子里呆一个小时。我的探视和邮件受到监视，我和我的律师被防弹玻璃窗隔开，我几乎不被允许购买额外的用品，牢房里没有其他囚犯的探视，独自洗澡，最多可以读 30 本书，没有收音机和五六份报纸和杂志订阅。

在我在那里的最后几年里，邮件限制放宽了，从 1991 年到 1993 年，我被允许每周两次在院子里慢跑。我在这里写的是我经历的精髓。

在我入狱的头五六年里，我学会了让我度过最后十年的生存策略。

这些是我在这里总结的经验。



回到入狱的第一天。你不知道你将被释放的那一天。5,500 天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使我回头看也是如此。

你当时看到的就是你当下生存所需要知道的：**我从哪里得到阅读和写作材料？我在哪里隐藏秘密信息？我应该在什么时候进行手机搜索？我的战友的牢房在哪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无聊是你最不关心的问题。

此外，你知道你为什么在那里——与那些不知道的人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这是一个激进的政治挑战，让你到达那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你通过参与激进的左翼政治而选择的生活的“又一步”。

当然，他们当时对你不利，但监狱是一个新的领域，他们仍然必须证明他们可以打破你。这正是你绝不能允许他们做的事情——而这反过来又定义了你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挣扎。

有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前线，可以让你打得很好。你绝不能让他们说服你，没有明确的前线，“老大哥”是你的朋友。乌尔里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¹ 的宣言“人民反对权力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完美地总结了这一点。记忆能力需要政治或道德信念。

那些失去这种信念的人拒绝记住，并迷失在自我反省、自怜和缺乏方向中。这是绝望可以变成自杀，政治否认可以变成背叛的急剧下降。

单独监禁和对社会接触（信件、访问、新闻）的控制，你也可以称之为洗脑，旨在让你忘记并变得自负。抵抗、团结、责任、集体主义和相应的人格将消失。

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也遵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原则，即“每个人都是他/她自己最好的朋友”。那些采用这一原则的人无法生存——他们变成了另一个人。

不是因为他们成长并实现了解放，而是因为他们倒退和去社会化。其后果是去政治化和人格的瓦解。

真正的生存意味着将自己体验为一个在社会、政治、精神和情感上自主和自我负责的人。这需要打破隔离并在细胞外找到参考点。那些无法超越自己的监禁，无法在更广阔背景下理解它的人，将无法在他们的艰苦处境中找到意义。你的视野越窄，你的个人恐惧就越麻痹和绝望。让·埃默里（Jean Amery¹）曾将“参考点”与奥斯威辛集中营最极端的经历联系起来：

“你必须意识到，”一位虔诚的犹太人曾经告诉我，“你的智慧和教育在这里一文不值。然而，我知道我上帝会报仇的。一位自1933年以来一直在集中营的德国左翼同志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一点：“你们就是这样，资产阶级无所不知，当党卫军出现时，你们会发抖。我们不会害怕，即使我们在这里惨死，但我们知道跟随我们的同志会把他们都排成一排。这两个人都超越了自己，将自己投射到未来。...他们的信仰或意识形态使他们在世界上有一个稳定的点，使他们能够在精神上蔑视党卫军国家。”

君特·安德斯（Günter Anders²）称其为“绝望创造希望的悖论”。

在危险性低得多的西德高度戒备监狱的世界里，你的身体生存很少受到威胁。

有足够的食物、衣服、温暖和卫生条件——这与拉丁美洲军事监狱的条件大不相同。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您必须弄清楚如何在人格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生存。**

你如何保护自己？你如何组织你的防守？你什么时候必须进攻？第一个冲动当然是说：总是！但是，在政治上采取行动意味着评估权力平衡和你行为的后果——包括在监狱里。

当然，这可能很有趣，但几乎肯定会造成时间的困扰和影响。然而，在1980年，当第一批囚犯被转移到莫阿比特新建的最高安全单元时，¹将自己挡在牢房拆除的家具后面是

有道理的。这表明你拒绝自愿去这个单位，你拒绝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接受你的病情恶化。

如果你不表现出这种抗拒，就会让他们过度自信，你会在新环境中感到无能为力。在莫阿比特的案例中，同志们在外面抗议，有激进的行动，媒体的报道是巨大的。

为了在最大的安全条件下生存下来，这一切都非常有帮助。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绝食抗议——尽管对他们的确切情况和某些要求提出了批评——是隔离囚犯和最高安全单位的“生存策略”。

霍尔格·梅因斯（Holger Meins）和西格德·德布斯（Sigurd Debus²）死于医疗疏忽和强制喂食后，他们之间的声援运动无疑有助于他们被监禁的战友的生存。

以下是我自己经验中立即生存策略的一个例子：1983年，当局打算实施一种新模式，将一小群囚犯隔离在比勒费尔德的最高安全单位中。计划用一个极其严格的制度来补充最大的安全架构：对于一个肮脏的水槽，你会在院子里浪费三天时间，关闭公共休息室愚蠢的、监狱选择的电视节目意味着被关在牢房里两周，等等。

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强迫劳动计划：在闭路电视监控下，每周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时，组装3000个衣夹，并对不良产出采取纪律处分。

在所有心理调节中，重复和麻木活动的执行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种针对身体的经典洗脑手段。组装多年的衣夹等同于缓慢的精神死亡。对拒绝工作的惩罚是漏洞。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绝食（可能持续数周）是困难的，而且无论如何，由于一切似乎都处于危险之中，唯一可用的手段就是口渴。口渴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管怎样。

公众压力必须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压力必须变得比他们对实施新的最高安全强迫劳动模式的兴趣更强大。

在这种情况下，生存策略是挑战他们解释为什么每天3000个衣夹值得一个人的死亡。

此外，有一种不言而喻但明确的理解，即如果他们真的在最高安全单位内实施强迫劳动，对监狱劳动制度的攻击将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在正规单位也无法维持监狱劳动，这将造成巨大的收入损失。

五天后，他们屈服了，遭受了重大财产损失：革命小组（Revolutionäre Zellen, RZ）轰炸了监狱局和两家从监狱劳动中获利的公司的办公室。除此之外，还有示威活动、科隆-奥森多夫最高安全部门的骚乱和负面新闻。

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尝试在最高安全设施中实施强迫劳动。

然而，大多数时候，囚犯的生活并不那么英勇。毕竟，英雄的天敌是日常生活。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生存策略的例子：如果你去看监狱牙医的请求，在两天内仍然被“忽视”，你可以把它贴在马桶上，然后可以拆下，在下次机会时放在你的牢房前——这样它就不会再被“忽视”了。

这将导致从团结账户中扣除一些钱，并将导致纪律处分，但你会去看牙医。

这种行动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拒绝牙科服务成为需要登记的财产损失的正式行为。

这意味着您可以选择提出法律投诉——这是监狱管理部门通常不想在这种小案件中处



理的。

当然，你不能整天敲打你的栏杆或踢你的门。你将无法保持很长时间。

然而，不能推倒铁栅栏或踢门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接受监狱的制度，并被迫接受比外面的规范要窄得多的规范。只有抵制这些规范，你才能保持你的个性。活着或被活着。

接受规范意味着你自己发展的终结。你对社会交往失去兴趣，拒绝接受环境和情况的变化。适应监狱制度意味着忘记个人的力量和成功。

这种适应无休止地复制自己，既是因为你害怕实际的政权，也是因为你害怕抵抗的个人后果。你失去了希望。最终，接受错误变成了拥抱规则。

乐观不仅取决于活动，抵制也取决于活动。

昏昏欲睡会让你变得愚蠢。仅仅考虑抵抗（纳粹称之为“内部移民”）不是生存策略；这是愤世嫉俗：你想一件事，但你做另一件事；或者你拒绝得出你思想的后果。

想象中的抵抗的实践有一个名字：预期行为。当你被动时，你会内化恐惧和绝望。这创造了——并复制了——听话的、神经质的囚犯。

这名囚犯对壮观的越狱或意外赦免的白日梦，属于当局认可的“给我们日常幻想”的类别。在监狱的“虚假生活”中，不可能有绝对正确的行为方式。

然而，关于你的行为的基本决定仍然可以做出——这些决定是你生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是教条主义的。它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屈服是错的吗？旧原则是否仍然有效？

你总是必须知道这一点；你总是必须重新说服自己。你的反应不能只是习惯。当涉及到他人的经历和观点时，你应该保持好奇心和开放性，你应该欣赏友好的建议。

根据你的记忆和你的知识做出明确的决定，同时接受矛盾并承认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变化，换句话说，辩证地思考，是你自己信念的坚实基础。

僵化和僵化的思维只能制造出一个甚至不允许最微小裂缝的外部框架。

如果一个细节看起来不对劲，那么一切似乎都不对劲.....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微小的裂缝有时会导致那些曾经自称“150%”信念的人崩溃。他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寻找一个新的框架。

这不一定有多大意义，但可能会导致更早的发布。看看霍斯特·马勒（Horst Mahler¹）的例子：经过大量的意识形态曲折，他最终选择了极右翼，在广泛研究了相关文献之后，他在1970年代后期得出了一个傲慢的结论，即马克思误解了黑格尔，我们都应该重新考虑我们对国家的理解。在《明镜周刊》的一次采访中，²他甚至超过了内政部长对国家机构的赞扬。他被提前释放。

当然，你会在政治上发展，反思你在入狱前所从事的政治实践，等等。

然而，辩证思维只会培养你的信念，即如果不推翻现行秩序，剥削、压迫、贫困和战争就不会消失。这就是你永远与内政部长分开的原因。

“屈服”是否是错误的问题可以简单地表达出来：你想和白天把你关起来的人谈谈，如果你试图在夜间逃跑，他准备向你开枪吗？你想和监狱的负责人谈谈，还是想和作为“预备役上尉”参加军事训练的人谈谈？

你想与联邦刑事局（Bundeskriminalamt, BKA）达成协议吗，该组织维护着一个名为“恐怖组织（前身为“Sicherheitsgruppe Bonn”，由纳粹帝国安全总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的前官员建立）的部门，该部门监视你的访客并参与了沃尔夫冈·格拉姆斯的死亡？⁴你想在他们面前鞠躬，只换取一些好处吗？

他们要求你的“理由”动摇了疯狂和背叛的摇篮，他们唤起的“常识”是“那个穿着灰色西



装的小个子男人，他从不犯错——但他总是在加别人的钱。（雷蒙德·钱德勒）

等待信件是甜蜜的，但很危险.....

睡到早上，盯着天花板.....

忘掉你的年龄，当心春天的夜晚.....

梦见玫瑰和花园是不好的，

但想想山和海洋就好了。

我给你的建议是：尽可能多地阅读和写作——

并忽略镜子

纳齐姆·希克梅特¹

给狱友的信

纳齐姆·希克梅特 (Nazim Hikmet) 的台词表达了纯粹的生存策略。信件是监狱墙壁上的重要裂缝，但专注于接收它们会让你产生依赖性。当他们到达时要高兴——当他们不来时，寻找其他值得高兴的东西。

睡到早上，盯着天花板看，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然而，阅读和写作到早上可能会，因为这意味着你很活跃。忘记自己的年龄，镜子消除了对错过生命的担忧。

美丽的春夜会引起对外面世界的可怕渴望。梦见玫瑰和花园，在一个你不应该被安抚的地方安抚你。想想未驯服的山海，就把你自己的问题放在眼里。

尽可能多地阅读和写作是最重要的建议;从长远来看，这是监狱中每一种生存策略的最重要要求。

当你面对的世界无法忍受时，书籍可以带你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即使你被困，它们也允许你旅行。这在单独监禁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此外，从长远来看，它可以帮助您通过阅读和写作与思想和人互动的生存策略。

在监狱令人筋疲力尽的单调背景下，这可能很困难，但这是你参与其中的先决条件。参与意味着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想法，让你活着。

没有人愿意年复一年地从你那里听到同样的故事，关于枪战或永恒的真理或你内心的问题。救世军可能想听你的哀叹，但没有人会把你视为政治主体。

一旦你在入狱的头几个月和几年里设法抵抗镇压，时间就会成为你的主要敌人。在身体上，你可以保持健康——即使在牢房里，你也可以锻炼身体，反正香烟、咖啡和糖果都太贵了。

然而，岁月的长短影响了创造生命轨迹的可能性，影响了体验整个生活的可能性——形成一种身份的东西。很难将自己的行为模式理解为连贯和有意义的。

在外表上，你可以相对确定你的知识，你是一个——当然，尽管在发展——总是同一个人，有他或她的兴趣、想法、推理和自信。

现在你总是要检查你的个性、你的意识和你的思考能力，看看这一切是否在你不知不觉中以某种方式改变。如果没有对你的思想、情绪和行为进行严格的自我反省，你就无法确定你是否仍然理性地思考和行动——这在以前是理所当然的。

“你可以通过改变事物来理解事物，”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辩证地说，纳齐姆·希克梅特 (Nazim Hikmet) 在上面描述的正是这种实现实践。阅读马克思和葛兰西、罗莎·卢森堡和阿萨塔·沙库尔、马尔科姆·X 和普里莫·列维、维拉·菲格纳和彼得·魏斯，或者阅读农民战争或黑豹的历史，¹ 或者阅读国际主义、自然科学、艺术史或国际象棋游戏——**所有这些都**不会突破你牢房的门槛，但它可以帮助你保持思考和讨论的能力。

阅读是与他人积极交流思想。语言是实践意识。写作就是生产。不会导致可交流思想的智力活动，即在说话或写作，从长远来看——不仅仅是在监狱里——变成了西西弗斯式的任务。

然而，你不是在一座神话般的山上生活、思考和写作，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在这种情况下：在监狱里。

你应该意识到你处境的矛盾对你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某些重要的政治实现可能更容易与日常生活的喧嚣保持一定距离，但你应该非常小心地对待所有需要感官体验的评估。

...无论如何，正是你的理论思考与当前左派问题的联系，即你的同志和外部朋友的问题，使你的学习和写作具有实际意义——可以让你度过很多年。



砰。门又关上了。然而，这一次，你在外面。这并不像逮捕那样令人惊讶，而且明显更令人愉快。不过，这同样令人困惑。你像火柴盒车一样旋转。

在你停下来并能够真正好好地环顾四周之前，需要一段时间，并撞到几个弯道。你的监狱生存策略帮助你应对一个不太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现在，你内化的所有策略都会妨碍你。

监狱的经历教会你保留对自己重要的东西，不要透露任何东西，不要让自己变得脆弱。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一委婉地说一一不敏感。朋友无法理解你（缺乏）反应。

在监狱里度过的时间既不令人振奋，也不是政治纲领。不可避免地获得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往往会导致避免具有挑战性的集体讨论。不想依赖任何事情会使可能的纽带复杂化。独处的能力变成了渴望独处。你对规范的抵制和你作为一个个体维持生计的斗争现在让你对群体持怀疑态度。

在监狱经历的严重性之后，左翼内部的争论往往显得无关紧要，甚至荒谬一一但当你表现出这一点时，你就显得傲慢自大。很难关闭你努力达到的对你情绪的控制，只是为了让他们无法利用你的情绪来对付你。

爱、恨、激情一一一切都被装在一个知识袋里，在你解开任何东西之前，你要仔细地回头看看。当然，你以这种方式让痛苦远离你。但幸福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变得不那么严重。事情变得更容易了。

尽管如此，一位前图帕马罗¹用以下文字描述的内容将留在你身边：

你意识到一个.....不能在不被自己厌恶的情况下舒适地生活，因为你相信那些理解但无所事事地生活在舒适中的人会崩溃。

无论如何，生存之后还有生命，值得活下去。肖恩·麦格芬（Sean McGuffin）²的评论是“年龄和诡计总是会打败青春和力量”，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安慰，就像你作为囚犯只能获得的有用程度的毅力、耐心和耐力一样。你还在这里，你仍然好奇。



1 指在全国各地运送政治活跃和其他具有破坏性的囚犯的做法，将他们短期关押在不同的监狱中，有效地破坏了他们的社会关系，并切断了他们与支持者、朋友和家人的联系。

1 克劳斯·维曼 (Klaus Viehmann) ，“Stadtguerilla und Klassenkampf—revised”，载于：jour fixe initiative berlin (ed.) : Klassen und Kämpfe, Münster: Unrast 2006, p. 72.

2 关于这四个团体的更多信息，见：André Moncourt 和 J. Smith, “West Germany's Guerillas: Overview”，<http://www.germanguerilla.com/overview.html>

1 社会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受欢迎的左翼大学教授，德国议会外反对派的同情者;被指控在 1972 年支持 RAF，并被暂时停职。

1 流行的左翼哲学家，宣传“具体的乌托邦”和“希望的原则”。

1 左翼记者，1970 年 RAF 联合创始人;她于 1975 年在斯塔姆海姆监狱死亡的原因仍未解决。

1 位犹太作家、抵抗战士和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1978 年自杀。

2 社会哲学家和激进的和平主义者;强调即使在最绝望的条件下也必须抵抗。

1 西德最大的监狱之一，由法国战俘于 1877 年至 1882 年建造;在纳粹政权下扩展。

2 名 RAF 囚犯;两人都死于囚犯的绝食抗议：1974 年，Holger Meins 因缺乏医疗护理;西格德·德布斯 (Sigurd Debus) 在 1981 年因强制喂食而被迫喂食。

1 支持学生叛乱的律师，RAF 的联合创始人;三年后，他远离了武装斗争，首先加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生团体 KPD/AO，然后是德国主要的“自由”政党 FDP，最后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 NPD。

2 《明镜周刊》是一份广为人知的德国周刊，因其“反恐”立场而臭名昭著。

3 TE = “恐怖主义”。

4 1993 年，RAF 成员与德国警察的一个特种部队在德国小镇火车站发生枪战。

一名警察死亡，沃尔夫冈·格拉姆斯受重伤;根据警方的报告，格拉姆斯随后自杀，而目击者声称他被一名警察近距离枪杀。

1 受欢迎的土耳其共产主义诗人，1963 年在俄罗斯流亡期间去世。

1 普里莫·列维 (Primo Levi) ，意大利作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俄罗斯社会革命家薇拉·菲格纳 (Vera Figner) 因参与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入狱 20 年;彼得·魏斯 (Peter Weiss) ，德国共产主义作家，以《抵抗美学》而闻名。

1 图帕马罗斯——乌拉圭城市游击运动;活跃于 1963 年至 1970 年代。

2 爱尔兰作家，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吵闹”;1970 年代因涉嫌加入爱尔兰共和军而被英国军队监禁。